

袁枚暨性灵派

费振刚◎主编 王英志◎著

诗传

(上)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

费振刚 主编

袁枚暨性灵派诗传（上）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论袁牧暨性灵派.....	1
诗 选	
袁 枚	
钱塘江怀古	97
琵琶亭	100
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	102
别常宁	106
黄鹤楼	108
题柳毅祠	109
汉江遇风	111
黄金台	113
陇上作	115
良乡雾	118
落 花 · 十五首选一	119
苦灾行	120
捕蝗曲	124
征漕叹	127
李昌谷有《马诗二十一首》，余仿之作	
剑诗 · 二十二首选一	132

沭阳移知江宁，别吏民于黄河岸上	133
偶 见	135
挂 冠 · 四首选一	136
洲上寄南台	138
浴	139
归家即事	140
正月十七夜	147
江中看月作	148
芟 竹	150
偕香亭、豫庭登永庆寺塔有作	151
七月二十日夜	152
老将行	153
杂 诗 · 八首选一	155
南楼观雨歌	157
水西亭夜坐	161
元夕过关山岭雪不止	163
大风过凤阳	164
茅 店	166
沙 沟	167
山 泥	168
寄聪娘 · 六首选二	169
马 嵬 · 四首选一	171
登华山	172
古 意 · 四首选一	175
再题马嵬驿 · 四首选一	176

雨	177
瘞梓人诗	178
南楼独坐 · 二首选一	180
买 梅	181
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 · 二首选一	182
即 事	183
过葵巷旧宅	184
题柳如是画像	186
偶然作 · 十三首选一	190
客 至	192
投郑板桥明府	193
推 窗	195
子才子歌示庄念农	196
春日杂诗 · 十二首选一	204
哭三妹五十韵	205
自 嘲	212
嫁女词 · 四首选一	214
春日杂诗 · 十二首选一	216
病中赠内	217
题史阁部遗像 · 有序 · 四首选一	218
二月十六日苏州信来，道孀女病危， 余买舟往视，至丹阳闻讣	220
续诗品 · 二十三首选一	222
落 日	224
还杭州 · 五首选一	225

在邓尉忆家中梅花，莞然有作·····	227
升 沉 ·····	229
鸡 ·····	230
题宋人诗话 ·····	231
所 见 ·····	233
玩 月 ·····	234
施将军庙 ·····	235
谢赵耘松观察见访湖上，兼题其所著 《瓯北集》·二首选一 ·····	237
自 题 ·····	239
遣兴杂诗·七首选一 ·····	240
仿元遗山论诗·三十八首选一 ·····	241
新昌道中 ·····	243
山 行 ·····	244
黄岩道中 ·····	245
卓笔峰·二首选一 ·····	246
看山有得作诗示霞裳 ·····	247
悼 松 ·····	249
小心坡 ·····	252
从端江到桂林，一路山水奇绝，有突 过天台、雁荡者，赋六言九章，恐 未足形容，终抱歉于山灵也·九首选一 ·····	253
独秀峰 ·····	254
兴 安 ·····	255
遣怀杂诗·二十四首选一 ·····	256

对书叹	257
庚戌春暮寓西湖孙氏宝石山庄, 临行	
赋诗纪事 · 十二首选一	259
遣 兴 · 二十四首选二	261
二闺秀诗	263
示 儿 · 二首选一	265
赵 翼	
阳湖晚归	266
题明太祖陵 · 四首选一	268
微山湖堤晚步	270
客兴	271
消夏绝句 · 十首选一	272
平定准噶尔饶歌 · 十首选一	273
再出古北口	274
过文信国祠同舫葦作 · 四首选一	275
题许松堂亡姬小像	277
后园居诗 · 九首选一	279
题吟芗所谱《蔡文姬归汉传奇》 · 八首选一	280
漫 兴 · 二首选一	282
西湖咏古 · 六首选一	283
湘江舟行	285
阳朔山观众猴下饮	287
高黎贡山歌	288
澜沧江	291

桂平道中	292
秤谷叹	293
平江道中	296
努 滩	297
将至朗州作	298
赤 壁	299
杂 题 · 九首选一	300
哭黄山月 · 二首选一	302
删改旧诗作	304
书 怀 · 三首选一	305
闲居读书作 · 四首选一	306
西湖晤袁子才喜赠	308
书所见 · 二首选一	309
渡太湖登马迹山 · 二首选一	310
陈湾山下大银杏树歌	311

论袁枚暨性灵派

关于“文学流派”的定义，界说不一。兹举三种：或曰：在一定历史时期里，文学见解和艺术风格近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；^①或曰：同一时代、同一国家的作家，由于思想、艺术、志趣的一致，或组织文学团体，或结成亲密友谊，或在文学上相互支持，且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相近、相似的风格，叫做文学流派；^②或曰：按照现行的文学理论，流派的形成至少应具备四个条件：1. 有着明确的文学主张；2. 有着公认的领袖；3. 在这个领袖周围有一个创作群体；4. 这个群体有着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风格。^③三说皆有道理，但却不无差异：第一种界说涵义比较宽泛，既适用于“自觉型的文学流派”，亦适用于“非自觉型的文学流派”。而第二种特别是第三种界说相对来说涵义则比较狭窄，或者说对文学流派的要求比较严格，只适用于自觉型的文学流派。但符合第二种特别是第三种界说的文学流派，自然是标准的文学流派。

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清代呈现中兴格局，大家名家众多，诗学观念多元，流派亦纷呈。自觉型诗派如以王士禛为首的神韵派，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，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，以翁方纲为首的肌理派，以及晚清的同光体诗派、诗界革命派等等，都颇著名。同时涌现了许多以地域划分但多属于非自觉型的小流派，如河朔诗派、岭南诗派、虞山诗派、常州诗派等等。在清代众多诗派中力量最强大、成绩最卓著、影响最深远，并最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是性灵派，性灵派亦是中国古代自觉型文

学流派中名声最著者之一。

“性灵派”之名乃今人所概括，在当时名为“随园派”，且出自性灵派主将袁枚之口。其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八云：

独吾门下有两君子焉：一韩廷秀，字绍真，金陵人；一吴貽咏，字种芝，桐城人。……韩《题刘霞裳〈两粤游草〉》云：“随园弟子半天下，提笔人人讲性情。读到君诗忽惊艳，每逢佳处见先生。经年共领江山趣，一点真传法乳清。努力更成三百首，《小仓集》定不单行。”余道此诗，亦“随园派”。

“随园派”这一流派名称的提出，充分反映了袁枚强烈的立派意识，亦表明性灵派在当时已产生影响。袁枚之立派是一种自觉意识，为立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如倡导“性灵说”，结交诗学观点相近的赵翼、张问陶等著名诗人，广招弟子（包括女弟子），编撰《随园诗话》鼓吹性灵诗人及其性灵诗，编校性灵派成员诗集、诗选等，在理论、人事、宣传等方面均下了功夫。同时代的姚鼐“断谓樊榭、简斋皆诗家之恶派”（《与鲍双五》），虽为“恶派”，但毕竟承认了厉鹗之浙派与袁枚之性灵派。道光体阁大学士翁心存咏袁枚云：“才名海内重袁丝，开出尖新派一支。”^④亦明确指出袁枚开派之功。此外近代林庆铨则从贬斥角度将性灵派径称为“袁派”，其《题简斋诗后》云：“《仓山》一集久风行，气骨全抛但说情。汉魏盛唐窥也未？空将袁派博时名。”要之，无论“随园派”，还是“袁派”，皆表明以袁枚为中心的性灵派之存在已被当代与后世所公认。

性灵派成员的组成，不似江西诗派有“宗派图”可“按图索骥”，亦不似江湖诗派有不同版本的江湖集总集可作为

“确定江湖诗派成员的原始依据”^⑤，更不似明代门户明显，如前后七子诗派结为社团可核查。性灵派成员的组成比较散漫、宽泛，迄今尚无论著明确界定性灵派包括哪些人，一般只涉及袁枚、赵翼、张问陶等少数性灵派骨干。我以为，性灵派成员的确定原则是以“随园派”之主将随园先生袁枚为核心，考察围绕他所形成的不同诗人群体。所谓以袁枚为核心应理解为两个层面：一是袁枚倡导的主真情、重个性、尚诗才的性灵说诗论，即性灵派的理论纲领；二是由袁枚生发的人际关系，这包括家族关系、师生关系、朋友关系等。根据对袁枚性灵说的认同，以及与袁枚具有某种亲密关系这两个条件，我们可以勾勒出性灵派构成的具体形态。袁枚为性灵派创立者或曰主将，自然当之无愧。赵翼为第二号重要人物，具有性灵派副将的地位。张问陶则为第三号人物，属于性灵派后期代表人物，故为殿军。钱钟书先生《谈艺录》有“袁、蒋、赵三家齐称，蒋与袁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类”，“宜以张船山代之”之说，甚是。其他骨干人物则有孙原湘、何士颙、舒位等，孙、何皆为随园弟子之佼佼者，唯舒位与袁枚没有直接关系，是个例外。而刘霞裳等二十余位弟子为“士卒”。这些人属于性灵派的“主力军”，或曰主体。另外有两支“偏师”：一是袁氏家族诗人，男性诗人以袁树、胡书巢、陆建为代表，女性诗人以袁家三妹袁棠、袁抒、袁机为代表；二是随园女弟子，以席佩兰、孙云凤、钱浣青等为代表，凡四十余人。一支主力军，两支“偏师”加盟，性灵派阵容十分庞大，而且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，前所未有。此有其时代与地域的思想文化背景，是特别值得注意的。

一、性灵派的文化背景

任何一个文学流派，都有其一定的美学思想为创作指南。清代性灵派则以其性灵说美学思想为创作追求。但性灵说美学思想并非无源之水，它实际是中国性灵美学思想的传统在清代乾嘉时期的成熟与完备，性灵说与以之为创作纲领的性灵派，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。但是，历史传统的发扬光大或复活，亦离不开现实土壤的滋养，清代性灵说与性灵派的出现，自有其当代的文化背景或曰时代的逻辑。

明末清初鼎革时期，清兵入关南下，铁蹄过处，战火燃烧，社会动荡，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。特别是原本经济繁荣的东南沿海地区更是元气大伤，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残。经济的萧条与清政权的高压政策逼退了晚明兴起的启蒙思潮。而清初统治者钳制人民思想，巩固统治，乃借助古人亡灵，大力推行程朱理学，如康熙朝即编纂推销《性理精义》《朱子全书》等理学典籍，在思想界形成了“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，非朱子之家理不敢行”（朱彝尊《传道录序》）的局面。康熙以来又大兴文字狱，迫使许多知识分子埋首训诂考据，故汉学颇盛，统治者亦加倡导，康乾时期“御纂”“钦定”的大型典籍甚多，固然有文化积累之功，但目的却是以汉学引导知识分子脱离现实。与此相应，在文学艺术领域曾被晚明文艺启蒙思潮冲击的正统观念、复古主义，又于清初抬头，鼓吹复古，宣传教化，注重学问，成为清前期文艺创作的逆流。

但是，随着清初各地抗清浪潮的逐渐平息，清统治者亦采取了一些促进生产发展的措施，社会经济于康熙后期又得以恢复，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亦开始活跃，到乾隆时期则形成所谓盛世局面。如手工业基础较好的苏杭地带，商

品生产有很大发展，丝织、棉织、造纸、瓷器、矿业、冶炼等大有超过明末之势。城市亦因之繁荣，市民队伍日益壮大。经济的繁荣，使一度消歇的追求民主与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潮亦渐兴起，虽然在总体上已无晚明的气势与力度，但历史的进步思潮毕竟又向前奔腾了。

在哲学思想战线上，康熙时期昂然站起了颜元、李璘与戴震等一批向程朱理学宣战的骁将，锐意扫荡意识形态领域的唯心主义、禁欲主义。

如在人性论问题上，程朱理学把人性分为“天命之性”与“气质之性”，认为前者至善，后者则有恶的一面；因此极力鼓吹唯心的“天命之性”即“义理之性”，旨在论证封建道德规范的先天合理性，以及“气质之性”改造成“天命之性”的必要性，显然是为封建教化服务的。颜元则针锋相对，坚持唯物的理气一元论，强调“气质”即人的自身肉体与精气是首要的，而“义理”善恶等道德属性是从属于气质的。故云：“非气质无以为性，非气质无以见性”（《存性编》卷一）。颜元弟子李璘同样主张“气外无理”（《中庸传注问》），与其师观点相呼应。

程朱理学的“天命之学”实际是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反动伦理学。理学家把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对立起来，视“天理”为真正的人性，而视“人欲”为罪恶的渊藪，旨在扼杀人们基本的物质要求与生理欲望，显然是一种僧侣主义、禁欲主义。戴震深恶痛绝之，予以抨击。其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发出理学家“以理杀人”的惊呼，一针见血。他指出人欲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生理需求，它包括“声色嗅味”等饮食男女、穿衣吃饭的需求。是人用以养“血气”的必需条件，所以人欲非恶；相反人欲只要合乎自然规律发展则是善，亦即是“理”，所谓“理者存于欲者也”。这就论证了“人欲”的合

理性，为人欲张目。而程朱理学的“灭人欲”则无视人之“饥寒号呼，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”的本能，则其“理欲之辨，造成忍而残杀之具”，“其所谓理者，同于酷吏之所谓法。酷吏以法杀人，后儒以理杀人”。（上引均见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）戴震的批判显露出反封建的民主精神锋芒。

性灵派主将袁枚亦加入批判程朱理学的行列。他与颜元的弟子程廷祚（绵庄）过从甚密，思想相通。如当程戴园因“颜、李讲学有异宋儒者”，“以为获罪于天”，袁枚则明确“颇不以为然”，（《与程戴园书》）并为颜、李批判程朱理学的激烈言行辩护，于《宋儒论》中赞扬“我朝有颜、李者”，对理学“侃侃然议之”即予以批判。因为袁枚亦认为“宋儒分气质之性、义理之性，大谬”，并反诘：“无气质则义理何所寄耶？”（《牍外餘言》）戴震批判理学“灭人欲”之说，袁枚亦于《清说》中宣传“老者思安、少者思怀”与“好货好色”之“情”与“欲”，并抬高到是“圣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”的地位。此外，颜元关于“男女者，人之大欲也，亦人之真情至性也”（《存人编》卷一）的观点，更为袁枚所汲取，认为：“人欲当处，即是天理。”（《再答彭尺木进士书》）

汉学之盛行，亦遭到有识之士的理论批判。袁枚是代表人物之一。首先，袁枚对考据对象“六经”大胆质疑：“‘六经’中惟《论语》《周易》可信，其他经多疑。”（《答定宇第二书》）借以动摇考据家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。其次，指出穷经考据与宋学皆“有弊”：“汉学偏于形而下者，故笺注之说多附会，虽舍器不足以明道。”（《答惠定宇书》）亦失去其价值。再次，推重“著作家像英雄豪杰，立功业之人”，而贬低考据家不过“如一乡之良，一国之善，歿而可祭于社者”（《牍外餘言》），没有什么大出息。

与哲学思想领域相对应，清初文学艺术领域的教化观、复

古思想、重学问观念亦不断受到进步美学思想的挑战。这主要反映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。

以画坛而论，清初受明末董其昌南宗文人画思想影响，以四王为代表，兴起复古与形式主义画风。康熙年间画家石涛则面对画坛上“我为某家役，非某家为我用”的复古模拟风气，一是强调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师法自然，二是强调“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咏乎我也”，“我之为我，自有我在。古之须眉，不能生我之须眉；古之肺腑，不能安入我之腹肠。我自发我之肺腑，揭我之须眉。”（《石涛画语录》）标举独具的性情、个性与创造精神，意在摆脱正统画派的束缚。石涛于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至二十八年（1689）居住南京、扬州。三十二年（1693）以后的人生最后十余年则定居扬州。扬州于康熙年间商业繁荣，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有较大发展，反传统的土壤肥沃，故继石涛之后，更有扬州八怪与石涛笙磬相应，倡导反传统、反道学、重创造、重写情的美学思想，而较之石涛更注重个性的自由表现及艺术的独创精神。“怪”正是这种个性与精神的概括。如边寿民云“画不可拾前人，而要得前人意”，郑板桥称“各有灵苗各自探”（《板桥题画》），李方膺说“画家门户终须立，不学元章与补之”，皆是突破传统束缚的思想。对于画境他们追求感情的尽情抒发，郑板桥所谓“画到神情飘没处，更无真像有真魂”（《板桥诗钞》）；八怪笔墨更好写发愤之作，借助各种意象抒发对现实的不满，对黎民的同情。

文坛反道学，反复古，追求个性，标举真情、情欲的美学思想有更突出的表现。非正统文学之小说，乾隆年间出现了经典之作《红楼梦》，它具有明显的反对封建正统思想、批评程朱理学的思想倾向，如对经济利禄人生态度的否定，关于要求个性解放的要求，男女追求爱情自由，冲破禁欲主义禁锢的渴

望，等等，皆是时代精神的反映。在创作方法上则崇尚真实、“实录”，反对“假拟妄称”；同时主张创新，“新奇别致”，反对公式化、概念化、千人一面、千口一腔，从而使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达到顶峰。

诗歌作为正统文学，似乎又重演了明代徐渭、汤显祖、李贽、公安派等人批判明七子的斗争。清初顺康诗坛杭州诗人毛先舒承明后七子王世贞、李攀龙遗绪，并受好友陈子龙影响，开清代论诗主格调、重诗教之先声，其《诗辨坻》即为“广诗之治于天下也”而作，目的在于“使天下之人皆自进于雍容夷愉，足以宣德志，竭忠孝，即天下称郅理焉”（陆圻景《诗辨坻序》）。这显然是倡导“温柔敦厚”的“诗教”说，为维护封建伦理纲常服务。其次，因其持明复古派胡应麟“诗之格以代降”（《诗薮》）的观点，故倡导复古、拟古，特别推崇汉魏，原因就是认为越古越“存古”，越有“矩度”。再次，则赞同明七子格调说，抨击明代性灵美学思想，于诗十分重视诗格、诗法等形式。毛氏的复古、格调观点遭到当时叶燮、徐增、吴乔的批判。如叶燮《原诗》论诗发展变化观，所谓“天道十年而一变”，诗歌创作亦有沿有革，有因有创；又强调诗“须有我之神明在内”之个性化，反对复古、模拟。徐增《而庵诗话》更明确标举“诗写性灵”，强调感情真实、自然，推重诗歌创作“贵自得”，“依人不得”，“不肯与人雷同”，其观点与其后袁枚性灵派观点已十分接近。吴乔《围炉诗话》标举“意为主将”，以情景、寄托为主旨，艺术形式技巧应为意服务；并提出“诗中须有人在”的“千古名言”（张海鹏《围炉诗话跋》），亦重性情、个性。但叶燮、吴乔仍持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观，直到后起的性灵派才提出反诗教的观点。

乾隆时期叶燮弟子沈德潜又重弹明七子与毛先舒复古、诗

教的老调，如其门人王昶所说：“苏州沈德潜独持格调说，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诗……以汉魏盛唐倡于吴下。”（《湖海诗传》卷二）。就主复古一点来看显然背叛了老师叶燮，而主“诗教”则又承师说而变本加厉。沈氏因备受乾隆皇帝恩宠，更自觉地维护封建伦理纲常，竭力宣扬“诗之为道，可以理性情，善伦物，感鬼神，设教邦国，应对诸侯，用如此其重也”（《说诗碎语》）的封建政治功用；且道学气十足地反对“艳诗”。尽管他以诗人的身份论诗时亦颇多精义，但他御用诗人色彩甚浓，其诗论的消极保守方面亦极突出，实际上阻碍了清诗的健康发展。在清代第二次复古之风兴起时，针锋相对进行论争的主力就是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诗人，他们较之前辈更全面、更彻底地清算了伪古典主义的过失，并将性灵美学思想予以系统化。可以说性灵派诗论与创作出现的直接原因就是反对沈德潜鼓吹复古、诗教观。

当然，清代新汉学兴盛，重学问考据；诗歌以学问为根柢，发展到以考据为诗，窒息了诗之性灵，亦是性灵派兴起的一个原因。清代诗歌好用典，早在清初顾炎武等人即已显示。其后浙派朱彝尊、厉鹗亦主张以学问为诗料，追求醇雅，所谓学人之诗，厉氏更好用宋人僻典，但尚不妨碍可写出好诗。待到乾隆翁方纲肌理派，则与汉学考据相应，竟以学问考据代替诗，夭阏性灵，袁枚所谓“误把抄书当作诗”（《仿元遗山论诗》），则等于取消了诗的抒情本质及以情感人的功能，将诗歌创作引向另一条歧途。性灵派大多数诗人都主张诗以白描为上，反对过份看重学问、以考据为诗，因此性灵派的兴起与这一诗坛背景不无关系。

总之，清初性灵诗学理论的成熟，进而性灵派队伍的崛起，既有历史的积淀，更有现实的条件，这就是康熙后期与乾隆年间，哲学领域与文艺领域反理学、反汉学、反复古、反诗